

人才配置与金融发展： 来自近代中国的实证（1897-1936）

by Chen Lin, Chicheng Ma, Yuchen Sun, and Yuchen Xu

金融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然而，对于影响金融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学界仍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本文从人力资本角度进行分析，检验人才供给对现代金融萌芽和发展的重要性。利用清末废科举这一人力资本制度冲击，我们发现由科举释放到金融市场的人才，显著推动了现代金融业的发展。

历史背景

在 1842 年部分开埠后，中国逐渐发展现代金融并涌现出大量现代银行。从 1845 年英国在香港设立的东藩汇理银行开始，截至 1936 年，中国的金融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共有 259 家中国银行在 207 个城市运营并设有 1296 个分支机构。与传统的中国钱庄提供本地小额贷款和其他非正式金融服务的方式不同，现代银行在管理方面更加专业和制度化，汇聚了更多的股东和资本，而且经营范围更加广泛，规模更大。因此，现代银行对人力资源有着独特的需求。

实际上，中国早已为经济现代化进行了人才储备。千年的科举制度建立了一套全国性的教育体系，培养了一个重视学识的文人阶层。科举制度向所有社会阶层开放，成为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为了在各地实现更多的社会阶级流动机会，清政府基于各州府规模、历次考试的表现等因素对每个州府分配了科举的录取名额。然而，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所强调的“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实际上将大多数人才引向官场。因此在 20 世纪之前，中国的人才基本进入官府体制出任官吏。

这一人才培养体制从 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后续一系列的战争失败后开始动摇。清政府于 1905 年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开始学习西方兴建现代学校。学生的求学目标也逐渐摆脱了局限于官府工作的范畴。废除科举制将学生推向就业市场的同时，现代银行业本身的特性也对知识分子起到了拉拢作用。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银行业能够提供高薪水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此外，迅速工业化的中国对大量资金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对金融人才的迫切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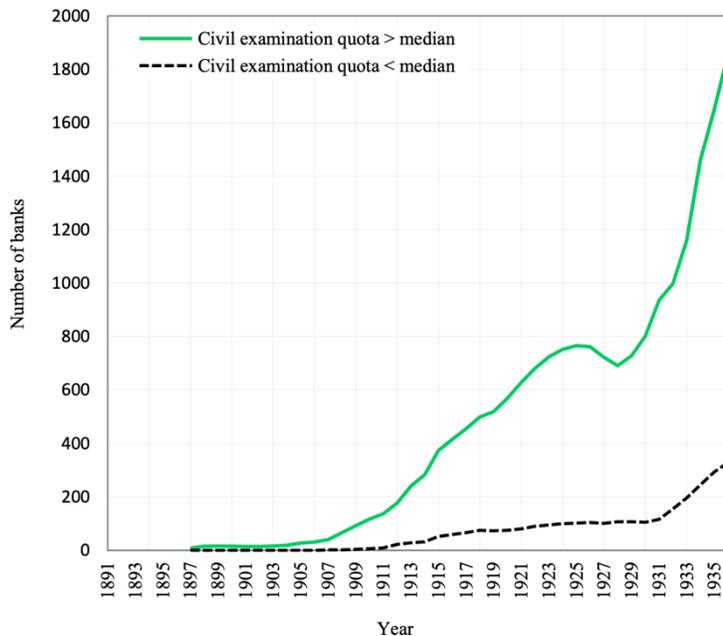


图 1 现代银行数量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其中横轴为年份，纵轴为现代银行数量，绿色线条代表了科举配额高于平均配额的地区，黑色虚线条代表了科举配额低于平均配额的地区

主要发现

数据：我们从各州府的方志和政府年鉴中收集了 1897 年至 1936 年的 821 家现代银行的数据，按年份在 281 个州府中进行分类。我们采用《银行年鉴》和《近代中国银行业机构人名大辞典》中银行董事会成员和经理的传记记录，量化了银行家在 1897 年至 1936 年间的流动情况。

首先，在废除科举制度后，具有更多科举配额的州府中，现代银行数量显著增长。平均而言，1905 年前多一倍考试名额的州府，银行数量增加了 2.36 家，相当于 1905 年后银行数量年均增长近 20%。

其次，废除科举考试后，拥有更多科举配额的地区，银行家数量显著增加。这表明人才由官府领域流向了金融领域。多一倍考试名额的州府在废除科举后银行家数量上升了 2.6 人。这种人才重新分配的趋势在废除科举后学生的专业选择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曾经科举配额较多的州府，学生选择商科（和金融）的比例明显更高。

第三，整体高报酬率、拥有更高金融发展潜力的州府以及更加靠近外资银行的地理位置等“拉动”因素将人才引向现代银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州府在废除科举前已经存在银行（较高的金融发展潜力）或靠近外资银行，则废除科举对于提高这些地区银行家数量的影响更为明显。

政策含义

研究表明，在现代金融发展中，人才供给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从传统官府系统向现代银行的人才转移不仅没有阻碍工业化的进程，而且还推动了先进技术的应用，为中国整体工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这凸显了那些历史上受科举制度束缚而拥有人才过剩的地区，在人才松绑后实现了经济的加速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并尤其促进了有外部融资需求公司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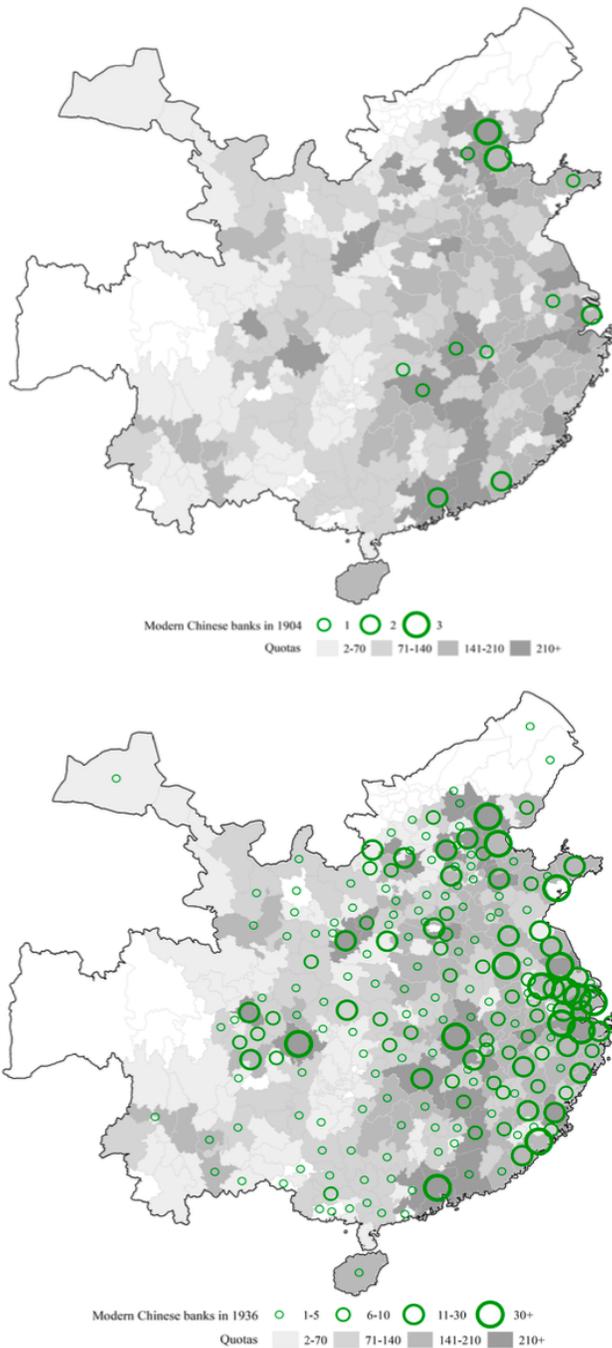


图 2 现代银行数量与先前科举配额的分布图。其中，各州府颜色的深浅代表了科举配额的多少，颜色越深则配额越多。绿色圆圈为现代银行数量，圆圈越大则现代银行数量越多。上下图分别为 1904 年（废除科举制前一年）和 1936 年的分布情况。（该图显示本文所用的样本区域，即清朝中原地区在 1911 年的 281 个府级行政区。清朝的边疆地区，由于缺乏相应数据，未被包括在本文研究样本。）

中国经济研究所（ICE）旨在促进对中国经济的研究，通过汇集全球的杰出思想和见解，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关键挑战。



**HKU
BUSINESS
SCHOOL**
港大經管學院

ICE
Institute of China Economy
中國經濟研究所